

天道维双，我心毅然

——记数学家王梓坤

张英伯

江西省吉安地区古称庐陵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，庐陵县隶属三十六郡之一的九江。庐陵位于赣江的中游，罗霄山脉的中段。从秦至清初的近两千年，赣江水道和大庾岭商路都是连接祖国南北交通的要道，扼湖南、江西两省的咽喉，因而商贾云集，农耕兴盛，手工业发达。

庐陵文化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，

素有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誉。从这里走出了历朝历代的16名状元，3000余名进士；走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，明代《永乐大典》总纂修解缙，四朝首辅大臣杨士奇。庐陵自古重视教育，民间多设塾馆、义学与书院；百姓家藏诗书，人多儒雅，序庠相望，弦诵相闻，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。自宋至清，庐陵大兴理学，



白鹭洲书院

各地的名流学者来书院讲学，布衣野老亦参与其中。南宋到明清的700年间，庐陵城的白鹭洲书院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冠。

然而自清以降，庐陵文化日渐衰败，光辉不再。庐陵在元朝时改称吉安，其文化在明代依然可圈可点。到了清朝，一方面中后期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放沿海通商口岸，赣水和大庾岭商路失去了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；另一方面，这一地区杀戮不断：清初八旗军队攻陷南京直扑江西时，吉安举起了反清的义旗，遭到残酷镇压；一百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，

吉安地方武装响应，协同太平军两次攻克吉安城，与清军淮军展开了八年的拉锯战；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吉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祥地之一，经历了国共双方的前三次围剿与反围剿，红军的九度攻打吉安，以及富田事变对所谓AB团的大规模清洗。吉安有46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，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,049人之多。到民国时代，吉安已经变成了高山阻隔、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。

这里就是数学家王梓坤的故乡和长大成人的地方。

童年趣事

连年战乱，使赣中百姓死伤无数，田土荒芜。与此同时，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平汉铁路于清末通车，连接广州与汉口的粤汉铁路在民国建成，铁路线上的长沙逐渐成为贯穿大江南北的交通重镇之一。于是吉安的殷实人家多有子弟赴湖南开店经商，不少贫寒人家的子弟则做店员谋生。在那个年月，店员

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，不但避开了繁重的田间劳作之苦，还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。但是做店员也有一个起码的条件，就是需要读过一点书，能记账会打算盘。

吉安县枫墅村的王肇基，读过几年私塾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因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同村老乡在湖南零陵（现永州市）开设的“恒和商号”聘为会计。王肇基为人沉静，话语不多，做事勤勉踏实，待人诚恳谦和，深得老板器重。王肇基很喜欢读书，爱听京剧，还会下棋、钓鱼。得益于庐陵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他克己忍让，宁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，从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从不与人争执，也从不讲别人的坏话。他的妻子郭香娥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，为人诚实，吃苦耐劳，但个性强，脾气躁，每当她在家使性子时，王肇基总是不做声。到1929年，他们夫妇的大儿子森材（学名梓青）已经16岁了。在森材之后还曾有过几个孩子，均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，夭折了。

1929年4月30日，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在零陵诞生，王肇基为他取名森福，学名梓坤。在湖南江西一带，这个孩子小名叫做“福伢子”或者“福毛”。

家乡枫墅村的另一位老乡在湖南衡阳开了一个“德成和绸缎庄”，资产和门面都比“恒和商号”要大得多。在福毛两岁左右，王肇基受雇于德成和，待遇提高了不少，生活也



王肇基的陶瓷画像（罗丹摄）



丰子恺画作：惟有旧巢燕，主人贫亦归

有所改善。那时他们全家租住在衡阳盐仓巷的一个大院子里。福毛在那里有自己的朋友圈，经常跟德成和老板的儿子王培生及他的妹妹一起玩耍。有一次他们学大人玩结婚，要福毛扮新郎，妹妹扮新娘。第一次福毛不肯，第二次福毛同意了，那妹妹又不肯了，结果没有玩成。福毛是个普通的孩子，但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小小的智慧。在他三岁时的一天，母亲买了鸭梨回家，喊福毛过来分梨吃。第一次给他一个梨，他拿到左手里，第二次给他一个拿到右手里，在给到第三个时，大人们围在旁边看福毛怎么办。结果他把左手中的梨夹到右肋下，接过了第三只梨。

福毛的父亲与一位李姓妇女要好，母亲也与她相处和睦，福毛称她为“李妈妈”。李妈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大胡子，两人只有一个叫做“桂伢子”的女儿。美丽温柔的李妈非常喜欢福毛，每次见到都把他揽进怀里，给他拿饼干、糖果、薯片来吃，还留他在家吃饭、睡觉。李妈炒的菜很香，福毛总要多吃些干饭。李妈每天早晨吃一碗开水冲的鲜鸡蛋，福毛来了就匀出一些给他。福

毛经常在李妈家里一住几天，不愿离开。李妈家在离盐仓不远的谢家巷，巷口有一家电影院，福毛在她家留宿时常常溜到电影院门口去玩。在那个年代，电影还是一件稀罕的事物。福毛五、六岁，看到人们热热闹闹地涌进去看电影，也很想跟进去看看。可是小孩子没钱买票，怎么办呢？突然，他发现一个小孩牵着大人的衣角走到门边，守门人并没有问孩子要票就让他们进去了。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正要进门，福毛灵机一动，牵着她的衣角混进了电影院。父亲到戏园子里看京剧时常常带上福毛，福毛也爱上了京剧。

福毛六岁的时候，被父母送到附近的“豫立小学”读书。他在那里成绩平平。班上的老师总是奖励作业做得好的孩子一张红纸，福毛只得到过一次。李妈有个邻居的小孩也刚读书，一次大人在纸上写了一个“日”字考考两个孩子，福毛说念“日”，邻家的孩子却读对了。让福毛高兴的是，有时上学带五分钱，可以在街上买一碗鱼粉，味道好极了。福毛度过了幸福的幼年时光，那时他的家境尚可，丰衣足食，父慈母爱，自由自在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前夕，中华民族陷入了外族侵略、国破家亡的巨大危机之中。灾难降临了，物价开始上涨，生意很不景气，店员们的工资随之下跌，有些人被辞退了。福毛的哥哥已经成家，他在湖南读过几年书，原本也在衡阳做事，失业后只身回乡种田。不久母亲怀抱周岁的弟弟，和嫂嫂一起尾随而去。福毛留在父亲身边，暂由李妈照管。这个唯一的弟弟五岁时在乡间池塘边玩耍，不幸落水身亡了。

父亲是非常喜爱福毛的，他觉得这个儿子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自己，天分不错，将来会有出息。作为一名店员，他没有将福毛培养成大才的非分之想，只是希望福毛多读点书，有能力找个好一点的差事干干。但是孩子离开母亲终非长久之计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母亲到衡阳来接他。李妈实在舍不得福毛离开，大哭一场。

母子二人乘汽车辗转回到枫墅村的老家。枫墅村是一个清雅秀丽的江南村落，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六百多人口。村后生长着一片繁茂的山林，村边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小溪。村



王梓坤家的老屋

里的房屋造型统一：淡灰色青砖垒墙、深黑色青瓦铺顶；屋顶中央镶嵌着采光用的玻璃天窗，两侧均为马头屋檐，墙壁上设有 32 开书本大小的孔洞通气；房屋建筑面积大约 150 平方米，中间是一个两层高的厅堂，两边的下层有四间卧室，后面是一间厨房，上层的阁楼堆放草料。村中的房屋排列整齐，每排之间用青石板铺路，同排相邻的房屋仅有一米间隔。富裕些的人家墙壁是一水的青砖，贫穷些的只在墙体外侧砌一层青砖，福毛家属于后者。

福毛和弟弟跟着母亲与兄嫂一家住在家乡的老屋。屋里老鼠很多，夜晚蚊虫轰鸣，不得不点一把稻草来熏，蚊子散了才得以入睡。家家户户的房子一模一样，福毛几次出门玩耍后找不到自己的家。好在乡亲们淳朴善良，每次都热情地把他送回去了。

枫墅村家家姓王，分成上下、前后四房，四房的总祠堂叫做敬爱堂。上下房共用宾公祠；前房有政公祠、葆元堂；福毛家所在的后房香火旺盛，读书人最多，建立了三多堂、立本堂、世美堂。清代的政府机构到县，民国时期到乡，乡村社会的细胞是宗族。由族

长管理祭奠祖先、婚丧嫁娶、调解纠纷等等族中诸项事务。祠堂有土地供族人租种，并有些资产用以救灾、帮学。世美堂在清朝曾经资助族中两兄弟考中了举人，立有碑文。

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，土地十分贫瘠。大多数人家或耕种自己的少许薄田，或租种富户和宗族的土地。每年初春，赣江水尚未转暖，他们已经在料峭的春寒中赶着水牛下田犁地了，赤脚在泥水中蹒跚，身子在冷雨中浸泡；夏天顶着烈日，低头用双手插秧，背脊晒得像要冒火；秋天割完稻子，围着木桶打禾，禾芒从衣缝中落到身上，刺如针扎。艰辛的劳作，困苦的生活，使得世代受到庐陵文化熏陶的枫墅村人大都有和王肇基相同的心愿：让孩子读一点书，将来走出大山谋生。各族的乡亲们商量着办一所村学，请了本村品学兼优的老知识分子王少诚先生当教员，村里的各家各户就是再穷再苦都要把孩子送去读书。

学校办在村东头的政公祠里，开学那天春光融融，风和日丽，7 岁的福毛由兄长带领到祠堂报名。从那天开始，福毛以他的学名王梓坤正式面对这个世界了。乡下人把“老师”叫做“师老”，少诚师老喜欢这个宽额头、高鼻梁、大耳朵、眉清目秀，略显单薄的孩子，夸他的名字起得好。王梓坤问：“怎么好啊？”师老说：“梓，家乡也；坤，大地也。”

师老一个人管着三十多名学生，他的工资是每个学生每年交一担谷（约合 100 斤），乡里各家杀猪，做红白喜事时都请他吃饭。师老戴副眼镜，中等偏胖身材，不苟言笑，在村民们当中颇受敬重。他教书很负责任，每天端一壶茶，一个水烟筒到祠堂上课，如果有学生淘气或者背不出书，则打手板或打屁股。村学的孩子们对师老畏之如虎，远远听到他一声咳嗽，这群赤脚小鬼便转瞬间逃得无影无踪。

村学不久后移至三多堂，堂中的地面内高外低，低处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池。孩子们课间嬉戏打闹时常从高处跌进池里，引起阵阵开心地大笑。

村学头一年的形式是私塾，读的第一本书是《论语》。师老手执书本和一只红笔将王梓坤喊到跟前，他念一句，王梓坤重复一



三多堂

句，然后他在句末画一个小红圆圈，表示教过了。每日教大半页，而且与日俱增。第二天再轮到王梓坤时，先把书交给师老，转过身去，背诵昨日的课文。背得好，再往下教，背得不好就打手心。王梓坤背书很快很熟，从来没有被打过手心。一年下来，他已经背完了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《论语》、曾子谈古代教育的《大学》以及谈儒家道德标准的《中庸》。这三部书连同谈仁政治国的《孟子》被宋代的程朱理学统称为《四书》。此外，师老还让王梓坤背过《古文观止》中的一些

文章，如出自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故事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就是师老点的。尽管七、八岁的孩子对文章的内容不甚了了，但是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像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”，还是懂的。而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，待人接物“调和折中，不偏不倚，不走极端”等等做人的道理，更是一点一滴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下根来。

师老受到过正规的新式师范教育，喜欢到县城走走，会会朋友，见识广，思想新。



私塾图，描绘了清末民初村学的情形（马海方作品）

仍然在衡阳做店员的父亲在王梓坤读初小期间两次回乡探亲。抗战时期工资微薄，养家糊口尚属不易，探亲是件大事情。父亲第一次回家是在福毛八岁多那年的腊月24日下午，正逢小年，在家里住了十几天。父亲带回来一叠一角一张的新钞票，每天要福毛去村里唯一的小商店买一角钱肉，大约四两。他爱抽烟，总要带些圆筒装的哈德门香烟。父亲慈祥可亲，不仅从来没有打过福毛，连责骂都没有过。福毛觉得他在家里的日子就像过节，幸福极了。父亲专门为他编了一本字典，是按照读音排列的，比如“一、衣、依、医、伊、夷、椅、益、意”排在一起，“王、汪、往、枉、罔、旺、望、忘”排在一起，看到第一个字就可以知道后面各字的读音。这种排法在当时也算得上一项创举，我国第一部按读音排列的字典，《新华字典》，在十几年后的1953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。父亲的字典后面还附有谜语、对联。谜语如：

两人两土两张口，普天之下处处有，
如是有入猜得出，半斤精肉一壶酒。
(打一字：墙)

对联如：

绿水本无忧，因风皱面，
青山原不老，为雪白头。

王肇基这本为儿子编撰的手写小书取名为《开卷有益》，可谓用心良苦。父亲见福毛认识了一些字，开始看小说了，便在离家返城不久寄回来《西游记》、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等书，还买了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让福毛练习写字。

父亲第二次回家时，福毛十岁了。这次父亲主要是教福毛打算盘，作为珠算能手，他可以双手同时开打。父亲教了乘除法，斤两（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）换算，甚至飞归（珠算中被除数是两位数的一种除法口诀），福毛学得很快。可惜父亲走后没有机会去用算盘，不久也就忘了。父亲喜欢挖了蚯蚓去河边钓鱼，福毛跟着一起去，也学会了。

农家的孩子放学之后，就要跟着大人下田。或浇菜、摘菜，或扯草、割禾，或放牛、砍柴，农活多得很，做也做不完。无论做什么活，王梓坤总是带着书去。他不跟孩子们玩耍，做完事就看书或游泳。有一次上山放牛，他看书入了迷，忘记管牛，牛偷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。王梓坤闯了祸，不敢告诉母亲，只好求嫂嫂去向人家赔礼道歉。还有一次，王梓坤弄来一本《杨家将演义》，白天没有看完，晚上家里又没有多余的灯油用来看书。于是他在第二天一早天才麻麻亮时起床，来到村头的大樟树下，借着微熹的晨光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。



村头大樟树，树下是王梓坤的堂侄王新林

王梓坤读书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懂得少。他读书很认真，遇到书上不认识的字就抄下来，集中在一起去问师老。师老真是厉害，不但所有的字都认识，还能讲出每个字的含义。有一次去问字时师老不在，王梓坤扫兴而归。两天后师老回来了，告诉他凡是不认识的字都可以查字典找到，并教给他查阅《康熙字典》的方法。但是王梓坤家买不起大部头的字典，于是他就鼓动王寄萍去买。可王家也嫌这部字典太贵，要付半担谷的价格。王梓坤四处打听，得知一位远房叔叔家里存有一部，就想借来看看。人家对这部字典非常珍爱，说是去家里查阅欢迎，借走则不行。于是王梓坤就到他家里用毛笔抄书，还有一些更小的孩子跟着替他研墨。

按照枫墅村的习俗，孩子读过三、四年书就可以了，王梓坤的母亲也是这样想的。初小四年读完以后，继读上高小就要到固江镇上的“吉安县立第三中心小学”去。那里离家8里远，需要在学校住宿，加之每个学期的学费，家里负担不起。一心求学的王梓坤再三请求，母亲总是不肯。于是王少诚老师几次来到他家，反复劝说他的母亲。师老说像王梓坤这样既聪明又勤奋的学生，不继续读书太可惜了，还说他多读一些书，将来可能谋到一份公事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。母亲终于松口答应他到固江镇去考高小了。考试对于王梓坤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，他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寄宿学校，学习更加努力，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。上算术课时，老师把坐在同一排的学生编成一组，在黑板上写一、两道题，每组推举一人上去演算竞赛，只要王梓坤上，该组必胜。

王梓坤在第三中心小学住读了半年多，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，大祸临头了。那是1940年，他十一岁。一天突然有人到学校里告诉他，“你爸生病回来了，在镇上的‘918’商店”。王梓坤赶忙跑过去看，父亲坐在一张凳子上，消瘦异常。王梓坤替他打扇，他闭着眼睛，坐着坐着，突然身子一歪，摔倒在地，王梓坤扶也扶不住。这时兄嫂闻讯从枫墅村赶了过来，几个人一起把他抬回家去。父亲的症状是完全不能进食。请了中医来看，每次用轿子抬来抬走，也说不清是

什么病，自然是不管用的。一天父亲躺在床上吃力地对王梓坤说：“要埋头苦干，埋头苦干。”他说过不多日子就去世了，终年不到五十岁。“埋头苦干”这四个字被王梓坤牢牢地记在心里，他用了一生的奋斗去实践父亲的遗言。

父亲去世，家中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。王梓坤的兄嫂前后生了六个孩子，四个女孩活了下来，两个男孩却夭折了。他们母子和兄嫂一家靠租种祠堂的几亩薄田度日，生活陷入了赤贫。

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王梓坤的宿费和伙食费了。但是小小的他求学的意志却十分坚定，说住不起学校，就走通学。走通学谈何容易，11岁的孩子每天往返十六、七里的丘陵，要走两个多钟头，村里没有人这样干过。每天清晨天还不亮，嫂嫂就起床煮饭，煮好后喊王梓坤起来吃早餐，并用一个竹筒装了饭菜给他做中餐。天麻麻亮王梓坤就上路了，嫂嫂送他一程。他摸索出一套一边走在田间小路上，一边读书的办法。他每天到校最早，学校没开门就在校门外的樟树下读书。最难的是有几次下大雨，水深齐腰，衣服全湿透了，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王梓坤咬着牙关一口气走到学校。同学们关心他，借衣服给他换上，老师还为他把湿衣服烤干了。有时放学晚了，天已擦黑。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小山，山上有一丛丛的小松树，王梓坤走到小山上天就全黑了，小松树在风中一摇一摆，就像一只只豺狼，传说中这一带虎狼多。小山下是一片坟地，荒凉凄惨，搞得王梓坤心惊胆战。母亲不放心，就到山坡上等他，倚树而望。

王梓坤走通学的事在枫墅村传开了，升入六年级时，同村的王顺纪、王崑山和王楚真同学也开始走通学。四个人结伴，路上有说有笑，不再觉得辛苦。王梓坤的点子多，大风大雨时，雨点斜着飞来，他让大家排成一行，头顶撑两把伞，冲着雨来的方向横打两把伞，雨就淋不到身上了。有一次，他们走公路回家，半路到旁边的小店休息，有几个士兵也在休息。王梓坤端起一只枪，对着一位同学的胸口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吓唬他玩，不料那士兵说，“枪里上了子弹”，王梓坤吓得直冒冷汗，万幸没有扣动扳机。

王梓坤家的后墙外是一条公路，有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追击一辆汽车，把它炸翻了。车是运货商高三元的，他与王梓坤的父亲相识，便到王家来借住，并给了一个银元做见面礼。王梓坤用银元请他三个走通学的朋友各吃了一碗米粉，剩下的钱买了松紧带，沿路拉着带子飞跑，四个孩子兴高采烈。不料母亲得知后特别生气，罚王梓坤跪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一顿痛打。这个节目上演了好多天，母亲一想起来就生气，就打他。在一次挨打时，嫂嫂从旁提醒道：“还不快跑。”这次事件给了王梓坤终生的教训，母亲的脾气是暴躁些，可是家中异常贫困，确实不应该浪费这一个银元。母亲虽不识字，但人很精明，她常说：“吃不穷，用不穷，不会打算一世穷。”脾气好时，母亲对王梓坤也很和蔼，冬天她在屋后做鞋，儿子坐在她脚前晒太阳，舒适而温馨。她对大儿媳也好，两人关系和谐，从不吵架。

高小每天都有朝会，由老师轮流训话。有一天的朝会上，刘郁文老师说：“我们学校已经规定不许喊同学的浑名（外号），现在又有人喊，而且还写在纸上。”原来是王梓坤跟一个长得胖胖的同学开玩笑，写了“胖冬瓜”三字放在他的课桌上。刘老师不由分

说把王梓坤叫上来，让他伸出左手，用竹板狠狠地打了十几下，打得手肿。这是他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挨打，因而印象深刻。

那时母亲烧饭、织布、养牛、喂鸡，主持家务，田里的壮劳力是他的哥哥，要干犁地挑粪等等最重的体力活，其它杂活儿力气活儿全归了嫂嫂。每隔二十来天，家里需要碾谷成米，都是嫂嫂推磨，辛苦异常；天不下雨，需要到田里车水，嫂嫂也是主力。王梓坤下了学跟去帮忙，边车水边读书，水板时常打脚。年长他十五岁的嫂嫂看着他，从不做声。这个贤良宽厚的农家女子，愿意承担更多的劳动，成全聪慧的弟弟读书。平日家中没有一分钱，每当要买油盐或遇到非用钱不可的事情，王梓坤就跟着嫂嫂挑谷到固江镇去卖，再打油回来，王梓坤还小，只能挑二、三十斤，主要的分量都在嫂嫂肩上。

王梓坤的学习成绩始终遥遥领先。有一次吉安县的高小为了检查教学质量进行统考，王梓坤在全县总分第一，数学120分的题目，他得满分，语文也是全县最高分。这件事在县里传开了，固安镇和枫墅村的人们都把王梓坤当作神童，使得他的启蒙老师王少诚颇为自豪。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，他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勤奋，他的成绩是辛苦



文天祥纪念馆